

## ● 汪高鑫

# 管仲改革与齐国霸业

齐桓公是我国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，而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则是我国春秋时期第一位名相。管仲出生于颍水之滨（今安徽省颍上县），在齐国任相期间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使齐国民富国强，成就霸业。

## 桓公登位，管仲相齐

春秋时期的齐国，大约在今天黄河下游的胶济铁路和莱州湾之间一带。这里东临大海，有取之不尽的鱼盐之利；土地辽阔而肥沃，便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；济水作为一条天然航道，成为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，有利于对外往来和商业、文化的发展。应该说，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，足以使齐国在那政权下移、诸侯纷争的年代里，雄踞天下霸主的地位。

然而，齐襄公却是一位荒淫无道、诛杀无度的国君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人人自危，弄得连自己的亲弟弟公子纠、公子小白都逃亡他国。公子纠在师傅管仲、召忽的护卫下逃往鲁国，公子小白在师傅鲍叔牙的护卫下逃到莒国。

公元前 686 年（齐襄公十二年），齐国发生兵变，齐襄公被

杀，其叔伯兄弟公孙无知自立为国君。次年，公孙无知又被国人所杀，引发了避难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即位之争。鲁国派出一支军队，由管仲率领，去截杀返回齐国的公子小白。公子小白假装中箭身亡而骗过管仲，赶回齐国抢先即位，是为齐桓公。随后，齐国大败进入齐境的鲁军，鲍叔牙率齐军乘胜大举进入鲁国，逼迫鲁国杀死公子纠，并交出管仲、召忽。

管仲被囚送到齐国后，鲍叔牙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为相。鲍叔牙与管仲青年时代就结为好友，鲍非常了解管的才能，并能体谅管的一些为世俗所不容的行为。管仲曾说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齐桓公原想让自己的师傅，且有拥立之功的鲍叔牙为相，但鲍叔牙一再推辞，力荐管仲出任齐相。鲍叔牙对齐桓公说：“君主若只想治理好齐国，用高傒和叔牙就足够了；若还想成就霸王功业，就非得任用管仲不可。”他还向齐桓公列举了自己在“宽和惠民”、“治国家不失其柄”、“忠惠可结于百姓”、“制礼义可法于四方”、“执枹鼓立于军门，使百姓皆加勇”5个方面都不如管仲强，若不用管仲，齐国就不可能强大。齐桓公虽是位大度有作为之君，对鲍叔牙也非常敬重，但要让他重用有一箭之仇的管仲，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。于是，鲍叔牙又进一步开导齐桓公说：“他当时用箭射您，是为了他的主子公子纠。您若赦免了他，让他做您的臣子，他也会像忠于公子纠那样忠于您的。”齐桓公被鲍叔牙的言辞所打动，决定重用管仲。

## 厉行改革，富国强兵

齐桓公决定拜管仲为齐相，辅佐自己治理齐国，期望齐国能够尽快富强起来。为表示对管仲的尊重，齐桓公还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沐浴一番后，亲自屈驾到城郊迎接管仲入朝。精于治道的管仲对齐桓公说：“治国之道，贱不能临贵，贫不能使富，疏不能

制近。”于是，齐桓公拜管仲为上卿，以使他高贵；又将齐国市租收入赐予他，使他富裕；为示与管仲亲密无间，齐国公称他为仲父。管仲得此三者后，便在齐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在政治上，实行“叁其国而伍其鄙”制度。春秋时期，随着奴隶制的逐渐瓦解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，各诸侯国居民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和居住区域开始被打破。管仲为使齐国广大人民能够各安其居，各守其业，以稳定统治秩序，在齐国实行了“叁其国而伍其鄙”的制度。“国（或称“都”）指都邑，主要居住着奴隶主贵族，还有部分平民、手工业者和商人。“叁其国”是根据“国”人的职业和等级，将“国”划分为 21 个乡，其中工商业者居住的工、商乡各 3 个，士人居住的士乡 15 个。15 个士乡又一分为三，由齐桓公本人和上卿国子、高子各管理 5 个。“国”中工、商、士分开居住，以 5 家为一个单位编制起来，不能杂居和迁徙。

“鄙”是指都邑以外的广大乡村，那里居住着广大的奴隶和农业小生产者。“伍其鄙”制规定：乡村居民每 30 家为 1 邑，设 1 司官；每 10 邑为 1 卒，设 1 卒帅；每 10 卒为 1 乡，设 1 乡帅；每 3 乡为 1 县，设 1 县帅；每 10 县为 1 属，设 1 大夫。当时齐国乡村共分 5 个属，分别由 5 个大夫来管理。“鄙”内各级官吏都必须向上一级官吏上报政情，大夫则把治内情况上报齐桓公。每年要对官吏进行考核，根据他们的政绩来决定黜陟赏罚。一般来讲，官吏一二次考核不佳者，不作追究；若 3 次考核都不合格，就要受到处罚。

“叁国伍鄙”制度的推行，当时确实能有效地防止人民任意迁徙和流亡，加强了国家对人民的控制，稳定了齐国的社会秩序。

在军事上，实行“作内政以寄军令”的兵民合一制度。管仲的军事改革是与其政治改革相辅相成的。“作内政以寄军令”意

思就是将军令寓于内政之中，使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统一起来。平时的行政组织，战时就成为战斗单位；平时从事生产的百姓，战时就成为参加战斗的士兵。这是一种寓兵于农、兵民合一的体制。

“参其国”制规定，国（都邑）中 15 个士乡，其行政组织是以 5 家为 1 轨，轨设轨长；10 轨为 1 里，里设里司；4 里为 1 连，连设连长；10 连为 1 乡，乡设良人；5 乡设 1 帅。共有 3 帅，分别由齐桓公和上卿国子、高子担任。与这种行政编制相对应，“作内政以寄军令”制规定：1 轨 5 家各出 1 人组成最小的战斗单位“伍”由轨长率领；10 轨 50 家各出 1 人共 50 人，组成 1“小戎”由里司率领；4 里 200 家出 200 人组成 1“卒”，由连长率领；10 连 2000 家出 2000 人组成 1“旅”，由良人率领；5 乡 1 万家出 1 万人组成 1“军”，由帅统领。齐国共 15 个士乡 3 万家，共出 3 万人，组成 3 军。3 军统帅自然也就是齐桓公、国子和高子 3 人，他们各掌 1 军。3 军的将官则统一由齐桓公任命。这一兵制决定了齐国的士人既是民众，又是士兵。他们平时既要守业，又得在春、秋两季进行军训，还得在战时出征。各级官吏平时是行政长官，既要管理治内行政事务，又得负责军训，还得在战时担任军事统领，指挥作战。

“作内政以寄军令”制度不但保证了国家拥有充足的兵源，而且这种兵民合一体制也有助于士兵之间的相互了解。他们平时是同耕共作的生产伙伴，战时是患难与共的战友，因此便于配合作战，保证军队战斗力。

为解决当时齐国军队装备短缺问题，管仲还制定了以兵器或铜铁赎罪的法令。此令规定：死罪可以用 1 副好犀牛皮制作的甲和 1 柄车戟赎免；轻罪可以用一副皮制的盾和 1 柄车戟赎免；小罪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铜铁赎免；一般民事纠纷也需交 1 束箭充作诉讼费。这样一来，齐国军队武器装备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。

在经济上，实行“相地而衰征”税制。商周以来所推行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。进入春秋后，随着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，农业生产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，井田以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开垦，这些新垦荒地成了不需向国家交纳贡税的私田。随着私田的大量增多，国家原有的土地制度——井田制逐渐受到破坏，土地占有与贡纳赋税日趋不合理，国家的贡税收入日益减少。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和贡税制度，管仲在齐国推行了“相地而衰征”的赋税制度。此制规定：对全国的土地进行清查，根据所占土地的多寡与好坏，来决定应该交纳贡赋的数量。此制的颁行意义重大：首先，规定无论公田还是私田，都需向国家交税，这样就打破了公私田之分，承认了私田的合法开垦，过去的井田制度也就随之而瓦解了。其次，按土地多少好坏来规定赋税的数量，使赋税负担更为合理，易于激发土地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；同时，又保证了贫瘠土地得以开发利用，扩大了土地的开发利用量，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再次，消除了土地和人口被隐瞒的现象，保证了国家有足够的赋税收入。因此，“相地而衰征”的税制，是一种利国利民的税制。

管仲深深懂得“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的道理，为此采取各种经济举措，以尽快发展齐国的经济。他充分利用齐国濒海盛产鱼盐的有利条件，大力发展鱼盐业。他采取鱼盐出口不收税的办法，以鼓励和刺激对外鱼盐贸易。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业，他专门设立盐铁官来管理。他还根据年岁丰歉和各地物产情况，设置“轻重九府”来集散谷物，调济物价，这一方面满足了各地区的需要，一方面又增加了国家收入。

总之，通过一系列的重大经济举措的出台，齐国新的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起来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得以调动起来，经济得以发展起来，国家收入得以增多起来。这一切为齐国霸业的建立，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

在用人上，推行“尊贤授德”的用人路线。管仲认为，选贤任能是国家富强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，因此是开明君主的首务、急务。针对当时诸侯纷争、各霸一方的政治格局，管仲明确认为：当今天下之争，首先就是人才之争；谁拥有人才，谁就能图霸或称王天下。

那么，贤与能又如何界定呢？管子明确提出了“三本”、“四固”的标准。“三本”是指不可以“德不当其位”、“功不当其禄”、“能不当其官”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德当其位、功当其禄、能当其官的人，才可称得上是贤能的人，统治者应该选拔和重用这样的贤能之人。“四固”则进一步明确提出，凡大德不至于仁爱，不可以授予国家权柄；遇到贤人不肯让位，不可以给予尊贵地位；用刑罚避开亲贵之人，不可以让其掌握军队；不喜欢本业、不务地利而又轻易聚敛财赋，不可以封给都邑。也就是说，凡大德至于仁爱，见贤肯于让位的人就是贤者；而刑罚不避亲贵，好本业、务地利而不轻易聚敛赋税的人就是能者。

管仲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过程中，始终坚持选贤任能的用人路线和“三本”、“四固”的用人标准，曾先后举荐和重用了宁戚、隰朋、王子城父、宾胥无、东郭牙等一大批优秀治国治民人才。当时的齐国可谓人才济济，荟萃于一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管仲主张“选贤论才，而待之以法”，即在强调人治的同时，主张应辅之以法治。首先是“以法择人”。管仲认为，只有依法来选拔和任用人才，才能杜绝举荐、任用人才时的“便辟得进”、“邪臣上通”、“请谒任举”、“朋党引进”等各种弊端，确保人才甄选和任用的真实和公正。其次是“以法量功”。管仲认为，“以法量功”就是要坚持爵禄同德、赏罚公平，使有功者得赏，有罪者得罚，避免“功多为上，禄赏为下”、“治行为上，爵列为下”的不合理现象发生，更要杜绝“权重之人，不论才能而得尊位”、“便辟左右，不论功能而有爵禄”的弊政出

现。

应该说，齐桓公时期齐国的贤能秀士满朝，离不开管仲的“尊贤授德”用人路线和“以法择人”、“以法量功”的法治思想。从很大程度上讲，齐桓公的霸业，正是依靠以管仲为首的这批杰出人才励精图治、积极进取而造就的。

在教育上，大力推行“四维”道德教化和四民分业教育管仲认为，道德教化是治理百姓、化民成俗的重要举措，是关系到政治成败的关键所在。而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便是礼义廉耻“四维”。在此“四维”中，管仲认为最根本的是礼义，恪守礼义，也就自然知廉耻。而礼有“八经”，即是上下有义，贵贱有分，长幼有等，贫富有度。义有“七体”，即是孝悌慈惠，以养亲戚；恭敬忠信，以事君上；中正比宜，以行礼节；整齐撙拙，以辟刑戮；纤啬省用，以备饥馑；敦悫纯固，以备祸乱；和协辑睦，以备寇戎。显然，管仲教导老百姓恪守礼义廉耻，目的是要让他们自觉地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秩序，固守本分，而不去做违背礼治、法纪的事情。只有这样，稳定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统治才能建立和巩固。所以管仲说：“守国之度在饰四维。”

在“四维”道德教化的具体推行上，管仲认为齐桓公作为君主，应该首先做出表率，垂范士民。他认为只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带头恪守礼义廉耻，底下的老百姓才会受到感化而加以效法，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美化社会风俗的目的。

在倡导“四维”道德教化的同时，管仲还在齐国大力推行四民分业教育。四民指士农工商，四民分业教育是一种四民分科的职业教育。前已叙及，在管仲的政治改革措施中，明确规定了士农工商四民不可杂居和相互迁徙。与之相适应，在知识和技能教育上，管仲主张对四民要分业而教，即针对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特点，分别施以军事、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四方面的教育。当然，士农工商四民都是要接受共同的“四维”道德教育的。

应该说，管仲在齐国推行四民分业教育，是适应其政治改革的一种需要，但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这种分业教育目的非常明确，针对性很强，易于在同一地区形成一种共同的教育氛围，有利于四科教育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持续、稳定，便于直接、快捷地为国家培养各方面的人才。当然，从根本上说，这种四民分业教育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，体现了教育与政治的一致性。

### 尊王攘夷，创建霸业

管仲对齐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用人和教育诸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后，齐国的国力迅速得到了增强，随后，齐国便在诸侯之间开展了一系列争霸活动。齐国所打出的旗号是“尊王攘夷”。所谓“尊王”，就是尊重周天子。众所周知，春秋伊始，各诸侯国就开始了相互征伐攻战，周天子已丧失了往日的权威，他名为天下共主，却无权号令天下。然而，周天子毕竟是天下宗主和正统所在。管仲深知，齐国要想创建霸业，除了有强大的国力外，还必须要借助于周天子的宗主身份，以便取得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政治优势。因此，在辅佐齐桓公创建霸业的过程中，管仲打出“尊王”的旗号，以使齐国在政治上、民心上取得主动。

所谓“攘夷”，就是抗击夷狄势力对中原的入侵。自三代以来，中原华夏民族一直以正统自居，而视周边民族为夷狄。春秋时期，随着周边民族势力的崛起，中原一些弱小诸侯国时常遭受他们的入侵。管仲深深懂得，齐国称霸，首先必须得到中原诸侯国的拥护和承认。因此，当中原华夏民族遭受周边民族入侵时，齐国就必须扮演好华夏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和保护者这个角色，从而在“攘夷”的旗号下树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。

齐国创建霸业的第一步，是确立在中原诸侯国中的霸主地

位。当时，中原各诸侯国较有实力的，除去齐国外，尚有鲁、郑、宋 3 国。郑国原本实力最强，只是因郑庄公死后，诸子争位，国势因此衰落了。宋国在与齐国最初联合抗鲁的斗争中，在乘丘和郟两次战役中，遭受鲁国重创，导致内乱，国力大损。因此，所谓中原争霸，实际上主要在齐、鲁两国之间展开。

齐桓公登位伊始，齐军就曾在乾时大败鲁军。公元前 684 年，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阻，在国内局势尚未安定的情况下，就想趁乾时之胜再次兴师攻打鲁国，结果在长勺被鲁国战败。不服输的齐桓公又联合宋国攻打鲁国，鲁国则首先攻击宋国，两创宋国，宋国因此出现内乱。齐国见此情景，只好不战而悄悄收兵。在这之后，在管仲的辅佐下，随着齐国国力的增强，齐国又连续 3 次对鲁国用兵，结果取得了胜利。这 3 次胜利，无疑成了齐、鲁势力消长的分水岭。此后，齐、鲁相持局面被打破，齐国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公元前 681 年，管仲看到会盟诸侯的条件已初步成熟，便借宋国内乱之事，精心策划了由齐国出面主持的北杏会盟，名义上是借此会盟与诸侯国商讨安定宋国的办法，实际是借此机会察看各诸侯国对齐国的态度，以树霸主之位。但因只有宋、陈、蔡、邾等国到会，齐桓公觉得有损于面子，会后就出兵将离北杏很近，却竟然应邀不到会的遂国灭掉，一是给自己出出气，二是做给四方诸侯特别是鲁国看看。此后诸侯国大都臣服了齐国，鲁国深感势单力薄，只好在这一年的冬天，与齐国在柯地结盟。

齐国与鲁国结盟，与鲁国有世仇的宋国很不高兴，一气之下，便与齐国断绝了关系。这自然使正在积极图谋霸业的齐桓公无法容忍。公元前 680 年，齐国联合陈、曹 2 国，并邀请周天子出兵，共同讨伐宋国。宋国见此情形，只好求和。管仲趁机建议齐桓公邀请周天子主持并派人参加鄆城会盟。齐国通过邀请周天子参加这两次活动，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在

诸侯国中的声望。公元前 679 年，管仲看到齐国称霸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让齐桓公邀请鲁、宋、卫、陈、郑等中原主要诸侯国，在鄆城主持第二次会盟，大家公推齐国为盟主。第二次鄆城会盟，标志着齐国创建霸业的第一步——称霸中原的任务已经完成。

鄆城会盟之后，一方面北方戎狄屡屡犯边，构成了对中原弱小诸侯国的严重威胁；另一方面南方的大国楚国并不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，也不派人前来参加齐国主持的会盟。管仲分析天下大势，劝说齐桓公应先安定中原，再去经略南方，被桓公接受。

公元前 664 年，山戎侵犯燕国，燕国向齐国求援，齐国出兵大败山戎，迫使其逃亡孤竹国。管仲为斩草除根，与齐桓公率军乘胜灭了孤竹国，山戎之患从此消除。燕国在齐国的救援下，不仅避免了亡国之祸，而且还扩地数百里，因此对齐国非常感激。公元前 661 年，狄人侵犯邢国，管仲认为邢国虽小，但华夏各国亲近如一家，应该出兵相救。当齐国出兵相救时，邢人已被狄人击溃，齐桓公就命令救邢大军修建新城夷仪，让邢人重新安居下来。公元前 660 年，狄人又侵犯并灭掉卫国，卫国新君戴公带着 5000 国人临时驻扎在曹城。齐国接到卫国求援后，出兵打退了狄人，并为卫国修建了新都城楚丘。在齐国的帮助下，卫国以新都城楚丘为中心，又开始恢复起来。齐国这两次重大的历史活动，历史上称作“存邢救卫”。齐国的“攘夷”之举，在中原诸侯国中树立起了仗义之君的形象。从此，中原各诸侯国更加信赖齐国了。

安定了中原，齐国便开始向楚国用兵，想迫使楚国承认它的霸主地位。公元前 656 年，齐桓公和管仲率领中原鲁、宋等 8 国联军，开始南征楚国。面对强大的中原联军，楚国多少有些虚，便派使臣屈完前来探听虚实。管仲责问楚使说：“楚国为何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？周昭王当年南征死于汉水，与你们楚国有

关。”楚使不卑不亢地回答说：“不贡苞茅 确是我们的不是。昭王为何死于汉水，我们并不知道，请去问问汉水吧！”管仲见楚使态度不硬也不软，知道楚国已有防备，联军因此不敢贸然进攻，便在陔驻扎下来。两军相持数月后，楚国派使臣屈完前来讲和。管仲心想，此次出兵的目的是要楚国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，而不是也不可能灭掉楚国，既然楚使前来讲和，正好给联军一个下台阶的机会，为何不顺水推舟呢？于是，联军后撤至召陵，齐楚双方缔结盟约修好。召陵之盟阻止了楚国向中原发展，稳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。

召陵之盟后，齐桓公还进行了数次会盟，特别是公元前 652 年支持周王室太子郑登上天子位，是为周襄王。这便是齐桓公所谓的“一匡天下”的功绩。公元前 651 年，齐桓公再次在葵丘会盟诸侯，鲁、宋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诸侯和周襄王的辅弼大臣宰孔参与了此次会盟。这次会盟，齐桓公代替周天子与各国订立盟约，规定结盟各国“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，不再相互攻击”。并代周襄王宣布禁令，要求各诸侯国不得废嫡立庶；不得以妾为妻；不得让妇人参政；不得壅塞河流，以使邻国遭殃；不得囤积粮食，各诸侯国应该相互赈济；大家一心，共同扶助天子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会盟，它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于顶峰。

公元前 645 年，即葵丘会盟以后第六年，一代杰出的政治家——管仲病故。临终前，他应齐桓公的请求，推荐了隰朋出掌齐国政权，并告诫齐桓公不可重用易牙、竖刁和开方 3 个近臣。管仲去世后，齐桓公并未接受他的忠告，重用了这 3 个近臣，结果仅过 3 年，桓公就被这 3 人害死了。随着管仲、齐桓公的去世，齐国的霸业也就终结了。

（本文作者是安徽省教育学院副教授）

## ● 张金铄

### 周瑜、鲁肃等人辅佐东吴

三国时期，人才辈出，激烈的群雄角逐，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。清代赵翼评论说，在历朝历代中，三国时期人才最多，表现最为突出，曹操、刘备、孙氏兄弟都善于用人，得到杰出人才的辅佐，从而各自成就帝业，造成三国鼎立局势。在魏、蜀、吴三国中，东吴是孙策、孙权兄弟建立起来的，由于孙氏兄弟推诚待人，做到人尽其才，从而得到大江南北豪强的支持，占据东南半壁江山，与曹操、刘备形成鼎足之势。在东吴创业和巩固过程中，江淮人物周瑜、鲁肃、吕蒙等人出谋定策，南征北伐，出力最多；蒋钦、周泰、陈武等人驰骋疆场，屡建战功，也为孙氏所信任。

#### 周瑜指挥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

东汉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，率兵南进，企图一举占领南方。孙权、刘备组成联军，共同抵抗曹军，发生赤壁之战。战争以曹操失败、孙刘联军胜利而告结束，从而奠定了三分天下局面的基础。这次战争的主要指挥者就是吴军都督周瑜。

周瑜，字公瑾，庐江郡舒县（今庐江县西南）人，生于东汉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出身官僚家庭，先祖曾任尚书令，父亲周异当过洛阳令。他资质风雅，精于兵法、音乐。少年时代与孙策相识，孙策留住寿春（今寿县）期间，周瑜把孙策家属接到舒县，让出住宅给他们居住。兴平二年（195年）孙策从淮南大军阀袁术处借兵3000向江东地区发展，周瑜率领数千人响应，并以舟船粮草资助孙策，从此参与孙策平定江东的军事行动。袁术赏识周瑜的才华，想把他留在寿春，周瑜婉言谢绝。不久，被任命为居巢（今巢湖市）县长。建安三年（198年）周瑜率众再次渡江，孙策亲自迎接，授他为建威中郎将。当时周瑜年仅24岁，江东地区都称他为周郎。不久，孙策派他坐镇牛诸（今庐江县南），招兵买马，积聚力量。次年，拜周瑜为中护军，领江夏太守，为进攻江夏、夺取荆州做准备。随即跟从孙策进攻皖城（今潜山县），逐走庐江太守刘勋。在皖城获当地大族桥公两女，均姿色超人。长称大乔（桥），次称小乔（桥），合称“二乔”。孙策自纳大乔，周瑜娶小乔为妻。又随孙策攻取寻阳（今江西九江）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庐陵（今江西泰和）雋郡。孙策回江东后，以周瑜领兵驻守巴丘（今湖南岳阳）。

建安五年（200年），孙策遇刺身死，周瑜奔丧回到江东，与长史张昭同心协力，辅佐孙权，把孙策旧部安抚下来。随后又连续出兵，平定境内反抗势力，使孙权在东南6郡（会稽、丹阳、吴、豫章、庐陵、庐江）的统治巩固起来。建安十三年，孙权派兵进攻江夏太守黄祖，以周瑜为前部都督，大破敌军，擒斩黄祖。就在这年9月，曹操亲率大军进攻荆州（治襄阳，今湖北襄樊）。荆州牧刘表病亡，其子刘琮不战而降。曹操兵不血刃取得荆州，又在当阳（今属湖北）大败刘备，气势雄盛。曹操一面集中水陆大军，沿江东下，准备消灭刘备；一面写信威胁孙权，扬言自己有水陆大军80万，要与孙权在江东决一胜负。

面对曹军威胁，孙权将吏大多主张迎降。张昭等人除了重弹曹操代表汉朝、拒之不顺等老调外，还强调曹操新得荆州水军及“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”等理由。只有鲁肃反对迎降，并请孙权召回在外领兵的周瑜商讨对策。周瑜到达柴桑后，主张坚决抵抗，并向孙权分析曹军弱点，指出：“凉州马超、韩遂尚未平服，威胁曹操后方，曹军有后顾之忧，此其一；曹操舍弃鞍马之便，改用水军与我争高下，这是舍长就短，此其二；现值隆冬季节，天寒地冻，马缺草料，北方士卒远涉江湖，水土不服，易生疾病，此其三。曹操恃胜而骄，不顾上述用兵大忌，轻率发动进攻，这是取败之道。将军给我几万精兵，定可打败曹操。”孙权听罢周瑜的分析，非常激动，坚定了抗曹决心，他拔出宝剑，砍去奏案的一角，厉声说道：“诸将敢有再说迎降，如同奏案一样。”

当晚周瑜又进见孙权，再对曹军情况进行分析，指出：“曹操声称水陆大军 80 万，并不符合实际，诸将不辨虚实而倡言迎降，毫无道理。据我推测，曹操手中北方军兵不过十五六万，荆州水军也不过七八万。而北方军兵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，荆州水军刚刚归附，人心不稳，所以数量虽多，并不可怕。如果我有 5 万精兵，定可挫败曹操，请将军放心。”孙权听罢十分感慨，他对周瑜说：“你的这番话，正合我的心意。张昭、秦松这些人只顾自己，令我失望。只有你与鲁肃和我态度一致，这是上天安排你们来扶持我啊！5 万精兵一时难以备齐，已经准备精兵 3 万，船粮军械亦已办妥。你领军队先行。我随后前来增援，誓同曹操一决雌雄。”

这时，刘备退驻夏口（今湖北武汉市汉口），派诸葛亮出使东吴，双方达成联合抗曹的协议。于是孙权命周瑜与老将程普分别担任左、右都督，鲁肃参赞军事，统领 3 万精兵，会同刘备军队溯江而上，组成孙刘联军。两军相遇于长江南岸的赤壁（今湖

北嘉鱼东北)，这时曹军中流行疾疫，刚一交锋，曹军就受了挫折，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，准备再战。与此同时，曹操已经发现了自己军队不习水战的严重弱点，于是下令把所有战船用铁索连上，上铺木板，让它们首尾相接，以防止风浪的颠簸和敌军偷袭。但这样做，却大大削弱了水军的机动性。吴将黄盖看到这种情况，建议用火攻战术，焚毁曹军战船。周瑜采纳了这一意见，并派黄盖诈降曹操，以便接近曹营。黄盖向曹操送交诈降书后，挑选蒙冲斗舰 10 艘，内装干荻枯柴，灌以油脂，覆上帐幕，竖起旌旗，顺风驶往对岸的曹营。曹操对黄盖虽非完全相信，但丝毫未曾料到孙刘联军会采用火攻，因此没有任何预防措施。所以当黄盖船舰已经接近，吴兵高喊投降的时候，曹军官兵还伸颈观望，并指着来舰传述黄盖投降的消息。黄盖距离曹军只有两里多远的时候，命各舰一齐点火。猛烈的东南风助长了火势，奔驰的船舰顷刻间就把火烧到曹军船舰上，并且迅速蔓延到岸上的营寨。曹军大乱，人马被烧死和溺死的甚众。周瑜、刘备水陆并进，擂鼓之声，震天动地。曹操大败，率领余众从华容道向江陵撤退。后又担心北方发生变故，不敢在荆州停留，留亲信大将曹仁守江陵，乐进守襄阳，自己引兵北还。

周瑜进攻江陵，经过 1 年多的苦战将城拿下，迫使曹军退守襄、樊。在此期间，刘备除以少数兵力协助周瑜攻江陵外，主力部队南下攻占了荆州长江以南的 4 个郡，即武陵（今湖南常德）、长沙、桂阳（今湖南郴州）、零陵（今属湖南）4 郡。

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三国的曹、孙、刘三家都参加了战斗，周瑜是孙刘联军的主要指挥者，战后声威远震，名扬天下。曹操回到北方，极力为自己失败辩解，他写信给孙权说：“赤壁会战，正值大军疾病流行，所以烧船退军，从而才使周瑜出名。”经此败仗，曹操暂时无力大举南进，而孙、刘双方势力得以获得发展，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。

曹仁退出江陵后，孙权获得江陵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。随即以周瑜为偏将军，领南郡太守，驻守江陵。周瑜亲自进见孙权，建议攻取益州，占领汉中，联络马超等人，与曹操争夺天下，得到孙权的赞同。建安十五年（210年），周瑜返回江陵，病死于巴丘，时年36岁。孙权十分痛惜，他对群僚说：“公瑾有王佐之才，如今短命，我将依赖谁呢！”后来称帝时又说：“没有周公瑾，我是做不到这个位子的。”因此，对其后嗣报以优厚待遇。周瑜有2子1女，女配太子孙登，长子胤尚公主，次子循妻以（孙权）姪女。

### 鲁肃坚持联刘抗曹

在曹、孙、刘三家势力中，曹操势力最为强大，孙、刘两家单独无法与之抗衡，只有结成联盟才能自存。鲁肃是东吴集团中最有远见的人物，最早提出联合刘备并坚持联刘抗曹，为孙刘联盟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鲁肃，字子敬，临淮郡东城县（今定远县境）人，出身富豪之家，为人豪爽，仗义疏财，经常周济贫困乡邻，深得当地好评。周瑜担任居巢县长时，带领部下造访，求他接济军粮。鲁家有两仓谷米，每仓3000石，鲁肃当即将1仓送给周瑜，两人从此成为至交。袁术任命他为东城县长，他见袁术昏愆，不能成就大业，率领乡邻投奔周瑜。后由周瑜引荐给孙权，很得孙权器重。一次，孙权与他合榻对饮，询问说：“当今天下大乱，汉室倾危，我想效法齐桓公、晋文公，成就霸业，望你有以指教。”鲁肃回答说：“曹操当权，将军怎能建立霸业！据我所料，汉室不能复兴，曹操一时也不能消灭。将军应当巩固江东，等待时机剿除黄祖，讨伐刘表，占据荆州，效法高祖刘邦，争夺天下。”孙权很赞赏鲁肃的意见。当时张昭年长，对于孙权如此看重鲁

肃，心怀不满，多次诋毁鲁肃谦恭不足，且年少缺乏经验。孙权不予理睬，并根据鲁肃意见进行行动。建安八年（203年）开始征讨江夏，战争时断时续，到建安十三年终于擒杀黄祖，扫除进军荆州的障碍。但孙权并未立即西进，而是注视形势变化。

荆州牧刘表，原是东汉名士，但他徒有虚名，并无政治才能。当时中原士民逃避战乱纷纷来到荆州，刘备兵败之后也率众前来依附，但都得不到重用。周围军阀都把荆州作为兼并的对象。黄祖被杀后，刘表只派长子刘琦担任江夏太守，也未采取其他行动。同年7月，刘表突然病死。刘表之死会给荆州带来什么样的变化？鲁肃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，敏锐地觉察到荆州内部存在的矛盾，以及作为“天下英雄”的刘备在荆州的地位和影响。他建议派人探询荆州形势，如果刘备与刘表部众同心同德，应当与他们结盟，否则，乘机袭取荆州。孙权随即以吊祭为名派鲁肃出使荆州。鲁肃抵达夏口时，便得到曹军南下，荆州失守，刘备南撤的消息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鲁肃不得不修改他的出使计划。他清醒地认识到，曹操所要得到的并非只是荆州，而要阻止曹军继续南进，维持江东政权，唯一的途径是要联合刘备。因此，当即往迎刘备，在当阳长坂与刘备相遇，劝告刘备前往江东，与孙权结盟，共同对付曹操。鲁肃的建议正与刘备、诸葛亮联孙抗曹方针不谋而合。刘备因此前往夏口，派诸葛亮出使东吴，鲁肃也回到江东。

此时，孙权正因曹操虚辞恫吓而举棋不定，张昭等人主张迎降。鲁肃听后很不以为然，他私下告诫孙权：“众人的议论，只会耽误将军事业，应当早下决心，抗击曹军。”孙权赞同鲁肃意见。当时，周瑜因军务留在鄱阳（今江西波阳）；鲁肃劝孙权召回周瑜，共商对策。在周瑜、鲁肃劝说下，孙权坚定抗曹决心，联合刘备，共同对敌。鲁肃担任赞军校尉，协助周瑜、程普筹划军事部署。赤壁之战后，鲁肃先行返回柴桑，孙权率众亲自迎